

第 1 章

中国经济 21 世纪的课题

一、渐进主义改革与市场化

1979 年以后 20 多年来的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改革被说成是渐进主义改革，与俄罗斯的急进式改革相比较，中国在这期间所达到的经济高度增长及其结果的 GNP 规模的扩大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等，许多经济成果受到了 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为首的西方政府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这种渐进主义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尤其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真正的经济市场化正在不断展开。那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现达到了何种程度呢？中国的一位研究者测算出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在 1997 年时大概在 51%（表 1-1）。在如何计算一个国家经济市场化水平的公式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定论，而这种计算还存在着，包括它的计算方法，与其他国家作比较的可能性等许多问题，但也许能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一个标准。

表 1-1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 (单位: %)

	1978 年	1980 年	1984 年	1987 年	1990 年	1993 年	1995 年	1997 年
产品的市场化水平	2.56	11.10	22.27	40.57	45.08	55.42	60.21	61.71
要素的市场化水平	0.0	2.17	7.88	11.79	14.69	22.15	30.89	36.57
企业的市场化水平	0.0	3.0	16.1	23.0	26.7	34.7	46.4	51.0
政府行为的 市场化适应水平	-	-	-	-	-	-	28.9	36.6
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3.3	4.2	7.7	13.7	15.4	19.1	22.2	21.3

资料来源：常修泽、高明华《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1 期。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已达到了 50% 以上，而是近 50% 还没有达到市场化。

中国经济正处于所谓的二重性转换过程，即从 1950 年确立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以及从封建时代以来长期的习惯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上的结构转变，可以说是一次未曾有的大转变。可以说这种转换的势头是一个激剧破坏旧习惯、创造新事物的“更新换代”时代。但在大转换的过程中，也有不容易被改变的事。最突出的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有从以企业与党之间关系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变化的党领导结构。可以说经济、社会上的结构转变与政治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结构的不变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结构转换

现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大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概括来说，是一种从毛泽东时代的封闭社会、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视生产的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开放社会、市场经济、肯定主导消费时代的转变。

1. 市场经济的利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起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为止大概30年中，中国在东西方冷战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西方各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禁止出口，因此受到了西方各国在战略物资及技术，甚至资金出口方面的对中管制，并且中国自己也选择了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道路。在50年代，能作为学习典范的先行事例，除了苏联之外再也没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时代的必然。

在毛泽东时代，利用计划经济并没有使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体验过这一点的中国，对当时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实施了向地方下放权力等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内部的改革，尽管是渐进式的但开始大胆利用市场经济。

而导致现在这种转变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2月28日），下面来引用一下它的重要部分。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解道理……总

之，为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务实者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调整时期，与刘少奇一起鼓励农村保留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三自一包政策），并主张“只要能使生产得到恢复，应该大胆采用市场因素”和“白猫黑猫论”，30年后他又很体面地上台了。

追从邓小平南巡讲话最高指示的是江泽民在同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所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报告，在这里，关于经济控制方面，他不是对“计划”而是对“市场”作了如下的描述。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还处于转换过程，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

(1) 政府对大部分生产资料与几乎所有消费资料价格的统一管理已经结束，而且通过配给制度对粮食、棉布等基本消费资料的分配也已结束，价格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放开。

《争鸣》1992年第4期。

《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2) 在计划经济时期紧紧依附于行政部门的企业现正在扩大经营自主权（参照表 1-2）。

(3) 在培育应适应市场经济并具有真正意义的企业这一点上，正在受到重视，作为过去具有生活保障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单位”的企业正在发生变化。

企业认识到了这种大变化。但另一方面，企业没有充分的投资决定权，许多企业并不具有贸易权等，在企业经营自主权上的限制还很多，作为课题还需加强经济市场化。

表 1-2 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的动向：赋予经营自主权的时期

（单位：%）

	80 年代以前	80 年代	90 年代	还没有
生产销售权	4.6	49.8	31.9	13.7
价格决定权	1.5	38.0	38.9	21.6
雇用权	0.6	22.5	39.7	37.3
解雇权	0.5	15.2	35.8	48.4
怀孕期间 2 年以内的投资	0.2	8.1	18.4	73.3
怀孕期间 2 年以上的投资	0.2	6.6	17.1	76.1
资产买入权	1.0	8.8	22.1	68.3
资产处理权	0.2	5.5	18.6	75.8

资料来源：和田义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经济开发与企业》，《开发援助研究》第 4 卷第 4 号，1997 年。

2. 迈向更加开放的体系

从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的转变也是一种社会经济上的大转变。

并不能说东西方冷战下的毛泽东时代是完全的封闭社会，在经济方面，拒绝外国投资，不向外国借款，不接受外国援助这种自给自足特征很明显，表示进出口对 GNP 比率的贸易依存度也仅仅是几个百分比。

看一下封闭体系时期中国的资金积累、筹措方法：50 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除了来自苏联的援助以外，必须在本国内部通过自力更生来积累资金。土地改革后，经过互助组的成立，大大加快了农村的集体化，在建国后不到 10 年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了这种突飞猛进的农村制度改革。其本意是，由政府完全掌握粮食、经济作物，甚至劳动力，利用农产品与工业产品间的剪刀差价格，确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实行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急进式制度改革是为了建立这种筹措资金机制，而这种观点现已几乎成为一种定论。但是，通过实施人民公社体制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来发展农业生产这种政策是失败的，因此于 1984 年解散了人民公社。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是属于经济开发论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这里并不想争论，而是想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的经济开发，它既不是实际带来经济发展、起飞的进口代替政策，也不是中国在封闭体系时期里所采取的仅仅在本国积累资金和自力更生型的发展经济。而是可以说，带来韩国、中国台湾省等亚洲新兴工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与起飞的，是积极引进外资政策和出口振兴工业化政策。经过 30 年的迂回曲折，中国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1979 年以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等积极引进外资政策，40 万个外国企业已经进入了中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实际投资总额突破了 3 000 亿美元，90 年代每年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 2 位吸收外资的国家。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外资企业在 1999 年分别大约占了中国一半的出口，工业生产总额的

15%，税收的 14%，固定资产形成的 11%，在像中国这样大国经济中，外国资本占这么大比率是没有先例的。这种积极引进外资和出口振兴工业化政策是最能说明这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一个因素。

这期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出口额 + 进口额 / GNP）从封闭体系期间的一位数增加到今天的 40% 多。在大国经济中，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是很少见的。

但是，20 年来实施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中国经济是无法维持下去，像这种“泡在外资里的”状况也是一个事实，对于中国的这种经济现状，受到了保守派还有与外资企业竞争中不得不破产、下岗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工等的反感，这也是一个反面的事实。

1986 年 7 月申请恢复以来，围绕加入 GATT/WTO（世界贸易组织）经过了 14 年的长期交涉，与最大难关的美国在 1999 年 11 月，与 EU 在 2000 年 5 月分别达成了妥协。不久的将来会实现 WTO 的加入，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不仅意味着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成衣品，家电产品等）的出口会更加扩大，而且会要求中国经济更加开放。也就是说，只有在短期内必须大规模地更加开放包括产品，服务行业，投资市场在内的国内市场，才能说对于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比前 20 年更加对外经济开放的局面将会出现，这会大大促进在国内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淘汰，而且迫使不仅是国有企业，还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产业的重新组合。

3. 消费革命

如果考察促使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这种转变的动力，可以断定那是人们在文化上、物质上的消费需要。毛泽东时代的低工资、低物价，结果是带来了低消费所谓的“三低时代”、“贫困的平等”的社会。从腐败与贫困、混乱与殖民

地化的旧社会基础上而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建国的党具有“统治正统性”。但在 30 年的毛泽东时代里，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上，与外国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等亚洲新兴工业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党与政府的经济政策转向了肯定消费、发展经济、提高收入这个方向。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里，首先有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并根据它们的生产量来分配和流通产品。现在的中国，正在转变成肯定消费，并根据大众的消费需求、市场要求而来流通，甚至组织生产。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对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的承认，以及外资企业的存在等所有制多元化也是以这个转变为基础的。这三个转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并带来了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社会、经济上的时代转变。

三、企业改革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生产主体是以国营企业为中心，但也存在着一部分集体企业。而且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时代存在的国营企业没有一点独立经营自主权，由上级管理部门掌握人事权，并几乎得全额上交生产利润，即使出现赤字，也不被追究经营责任。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与在市场经济下追求利润的主体、拥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相比较，它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国营企业的劳动者作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人公，他们与利润追求是毫无关系的。每个国营企业都构成了一个兼备生活保障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的“单位”社会。从这个“单位”能借到便宜的住房，可得到粮票、布票等多种消费品购买券，并能得到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另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单位”成员的档案，

因此在二重意义上党的领导被彻底地贯彻到了基层。

即使出现赤字也不会破产，职工也不会被解雇，另一方面，即使是赢利也不会增加工资，国营企业中一直持续着这种情况。

国营企业的正常指标中由于没有包括利润，因此国营企业没有面向市场的动机。而且没有形成根据大众消费需求来组织生产的体制。稀少的资源被优先分配到军工产业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被放在其后。

这种“五星红旗型”（后台很硬型）企业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生产率，是否面向市场型生产竞争并没有成为什么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的生产停顿了，大众的收入没有提高，由于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发展地区，以及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大大落后了。

中国终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东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起飞，成功地走上了高度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内外形势，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者特别是改革派的领导者，整体来说被称为邓小平改革，在企业改革方面，首先改变过去以国营企业为中心的所有制，即实行企业所有制的多样化，第二是致力于国营企业本身的改革。过去的国营企业现已变成了国有企业，并正在实行所有与经营的分离。另外，国有企业的生产占整个工业生产的比率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过去的集体企业再加上农村乡镇企业的出现，并对“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等私有制企业的承认，另外外资企业数量的增加等，中国的企业所有制已实现了多样化，国有部门的比重正在慢慢下降。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使国有企业大量破产的过程，也不是通过私有化这种手段，而是通过在原有国有企业的外围培育大量的非国有部门来实现的。在这点上，与俄罗斯、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成了鲜明的对照，并被称为渐进主义改革，甚至是增量型改革。过去的国营企业（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内容，也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扩大

国有企业经营权，以及引进股份公司制度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另外像在“抓大放小”里所看到的那样，由国家掌握重点国有企业，对其他的国有企业进行出卖、租赁等从而实行私有化。另外考虑到即将加入 WTO，为了培育能与世界性大企业竞争的企业而建立了“企业集团”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1998 年以来朱镕基改革的真实意图能在这里看到。

中国企业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这样大的激烈变化，那企业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像反复所说的那样，中国企业已经不是单一的国营企业，而是各种所有形态的企业同时并存，企业间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另外，在消费革命下，各企业的生产都面向市场，利润当然成为企业最大的指标，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虽还有所限制但正在不断扩大等，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企业在转变为本来意义上的企业的过程中，过去作为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的“单位”社会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功能，外部化、社会化的倾向在加强。对粮食、衣料等基本消费品的配给制已不再存在，实行市场化已经很久。至于住房，把过去的“单位分配住房”商品化了，即从借给职工转变成让职工买下，这使得企业的负担减轻了。与此相适应的，作为新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商品房买卖变成了促进消费的一种手段，但这种转变由于住房价格与劳动者平均收入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效应。另外对企业养老保险实行了社会统筹，即措施社会化这几年终于到了见成效的时候。向市场型企业的转变也包含着这个过程，同时这也是单位社会崩溃的过程。

最后是关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权问题。在过去的国营企业时代，在企业内部，由上级行政部门派遣的厂长是生产、经营的负责人即“经营者”，企业党支部书记是生活职能上的负责人，但存在着后者（党支部书记）实际掌握企业实权的倾向。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职工是主人公这个原则被制

度化，其实这种制度几乎是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而至于今天企业内部支配、控制状况，由于所有制实现了多样化，另外国有企业开始实行股份制公司制度等，除了过去的厂长责任制、企业党支部书记的“单位”领导、职工代表大会构成了企业内部的旧三会（旧的三个功能），董事会、监督委员会、股东大会这三个新的企业领导机构（新三会）已经出现。

这个新三会中，所谓董事会的董事长这个新的企业经营者的出现，在对今后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的支配、控制方面，是一种关键性的存在。在加快市场经济化程度中，考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者董事长，为了在市场中赢得竞争，获得利润不得不尽其所能。人们预测中国在 2000 年加入 WTO 几乎已成为定局，还有在朱镕基改革的极力推进下，引进企业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面对为了生存而竞争，对于失败者被迫破产、失业这种严峻的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不管怎样必然会进行下去。1999 年的江泽民讲话中^①，强调应保持旧三会与新三会的协调，特别鼓励企业党支部书记与党组织应成为董事会成员和兼任董事长。这是否能促进中国经济及其微观基础的企业真正转变这一点，可以说现正面临着—一个紧迫而重大的局面。

四、21 世纪的重大课题

20 世纪已经结束，21 世纪也已到来。在剧烈变动、激烈变化上，即使与前半期相比较，中国的 20 世纪后半期，是一点也不逊

江泽民《坚定信心，深化改革，开创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局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 年 8 月 12 日）》，《新华月报》1999 年第 9 期。

色的半个世纪。已了解到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越体制，存在着很多相似的课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及其他需要解决的课题，即使在发现形态上不同，但可以说是超越国家和体制的共同课题。

尤其对中国来说，可以说前面所提到的四个课题是下世纪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首先是环境问题。由于经济的大发展，尤其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承认而带来了所有制的多元化，因此公害问题正在频繁发生，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大气污染的发生、饮水的不足、水质污染等对健康正在产生重大危害。另外，有必要充分考虑到，在纠正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扩大的方案“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应避免由此而带来的对生态系统更加严重的破坏。

中国是超过 12 亿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的多少本身对于经济来说并不具有意义。但在与其他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人们预测到 2030 年人口会增加到 16.5 亿人与中国自身粮食增产能力的问题。中国已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及其自给这个问题。到 2030 年，如果不从现在的 5 亿吨水平增产到 6.5 亿吨的话，是无法维持的。

粮食生产量是根据每单位的收割量（土地生产率）和耕地面积相乘来计算的。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大约是国土面积的 10%。耕地的向外扩大，由于受到国土的形状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几乎已成为不可能，剩下的手段是如何提高土地生产率，但这需要劳动力的更加投入和对化学肥料、农药等追加投资，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农业有着很高的土地生产率，但其反面，很低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它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在农村劳动力中，乡镇企业已雇用了 1.3 亿劳动者，除掉向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流出人口 8 000 万人以外，大约还有 2.5 亿人在从事着以栽培粮食为主的农业劳动。人均粮食生产量仅仅是 2 吨。中国的农业问题是，在

构造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必须通过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投入以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如果乡镇企业职工和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不可能的话，必须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 2 倍。但这意味着如何增加就业就会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另外，石油作为今后更加需要的能源，进入 90 年代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纯进口国。如果考虑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用于产业的能源以及作为原材料的需求的扩大，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电力消费的增长，以及随着汽车的大众化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话，仅仅利用以塔里木油田为首的国内油田的开发和煤炭以及原子能发电等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由于出口振兴工业化政策的成功，最近中国已转为贸易顺差国家，外汇储备额也超过了 1 500 亿美元。当然，虽然这个数字几乎与外国的借款额相当，但外汇储备情况的好转，就使得有可能进口前面所提到的像小麦、石油这些商品。把已有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比较优势的产业，另外享受贸易利益的中国，即使引进一定量的粮食与石油是理所当然的话，但在 21 世纪的地球上，亚洲新兴工业发展地区，东盟各国以及中国所走过的投入增长型的增长道路在这以上是否还能被容忍，并且在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忧虑。

（佐佐木信彰）

第 2 章

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①，是由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决定的，同时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然后向服务化社会转变。产业的重点，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然后转向第三产业，并且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对这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等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与这个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产业政策的实施，是通过有意图地改变产业结构，发展经济来实现的。另外现在，由于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而进行了国际分工，因此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已成为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实行了重工业化政策。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中国不能享受到国际贸易的恩惠，并不管有无竞争力，必须在本国内培育所有的产业。因此，以原苏联的工业化典范，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快速实现

分析产业时，（1）把市场作为媒介的企业间关系（“产业组织论”），（2）根据生产工程类似性标准的各产业的关联（“产业关联论”），而且（3）产业的部门间构成（“产业构成论”），以上三种分析方法是有效的（宫泽健一《产业的经济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年，第11~14页）。在本章里，在所有意思上使用。

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纠正了走过头的“重工业化”，开始采取了优先发展轻工业政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量的外资开始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促进“轻工业化”（消费品产业）的发展。沿海地区，落实了“两头在外”（原材料购买与产品销路的海外依存）的出口型工业化，中国已变成了世界性生产据点。而且现在，在即将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为了加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并正在实行产业的“结构调整”。

本章，想大概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注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本章所说的“产业高度化”，是指在各产业部门内，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或者技术转变。如果实现了“产业高度化”，可以认为产业结构本身已达到了高度化。

一、中国的产业政策^① 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1. 改革开放以前的产业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采用了以原苏联为典范的计划经济体制（允许政府最大限度管理的产业政策）。当时的中国，农业部门占了压倒性比重（1952年，农林水产业分别占了“国民收入”的57.7%，劳动力的83.5%），为了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变，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力型的经济再生产结构。因此，实行了通过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来促进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实现长期高度增长的重工业优先

不仅在本国国民经济福利的提高上，而且在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国家的安全保障这个经济外的目的上，为了从现状来改变产业间或者在产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分配而进行的政府介入（丸川知雄编《过渡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亚洲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7页）。

发展战略。

“一五”计划（1953~1957年）中，国家把工业投资的88.8%投入重工业^①，特别是集中投资在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苏联156援助项目上。其结果，“一五”计划中，重工业年平均达到了25.4%的增长（轻工业12.8%），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49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其生产总额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比重）分别占了70%、12%、8%，但到了1952年，它们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8.5%、26.7%、14.8%，而1957年则分别是43.5%、29.2%、27.3%，重工业的比重快速上升^②。

此后，中国由于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不得不独自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继续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③。为实现重工业化而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只能有求于农业的“剩余”，决定了粮食义务供给制度（1953年实施），通过实施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剪刀差）政策，来实现向工业转移价值。农业变成了增产不增收（或者减收）。另外，工业劳动者的工资也被限制在最低水平。像这样，一边牺牲农民、劳动者，一边想来实现急躁的重工业建设目标（确立自立的再生产结构），但重工业无法保证供应农业、轻工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能源。1976年，据统计，重工业供应给轻工业的机械设备不超过它所有生产量的2.1%^④。

另外，当时在国家安全保障上，内陆地区在产业基地选择上要比沿海地区优先考虑。为了实现以军工产业为中心的内地地区的重工业化（三线建设），首先必须从铁路、道路等基本建设开始实施，并投入了庞大资金。

① 池田诚他《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法律文化社，1985年，第188页。

根据池田诚他《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法律文化社，1985年，190页，第4-1表

③ 1950年到1979年期间重工业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是50%，轻工业是5%，农业是12%（根据池田诚他《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法律文化社，1985年，第261页，5-1表）。

池田诚他《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法律文化社，1985年，第264页。

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速度—低效率”这种“恶性循环”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而且造成了大量无效率的国营企业（1993年宪法修改中，被改为国有企业，此后，统一为“国有企业”）。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调整产业结构，开始了改革开放。

2. 改革开放后的产业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确定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决定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开始尝试从过去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速度—低效率”的“恶性循环”，向“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低速度—高效率”的“良性循环”这个发展战略转变^①。

首先实行了从牺牲人民生活的“低消费—高储蓄”向丰富人民生活的“高消费—低储蓄”的转变。在疲惫不堪的农村，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降低了生产资料价格，并开始引进农村生产责任制，公开允许留有自留地，开设农村自由市场。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农民来说，已形成了通过自己努力能增产增收的体制^②；另一方面，在工业劳动者方面，改革了迄今为止的低工资制度，引进奖金制度、多劳多得制度，大大提高了工资水平。由于人们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可支配个人收入也快速增加，形成了购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耐用消费品）的热潮，开始了消费革命。

另一方面，从“高速度—低效率”向“低速度—高效率”的转变，前面所说的储蓄率（投资率）的降低部分，必须用提高效率，或者用潜在能力的发挥来弥补，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软预算约

河地重藏 藤本昭·上野秀夫《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世界思想社，1987年，第34页。

② 农产品生产量实现了飞跃性增加。1984年粮食生产量达到了4亿吨，粮食不足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